

我所知道的陈受钧：一位有国际声望的学者

■ 陶祖钰

精于教学：一张小纸片、一个小黑包

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没有自己的教材，都用英美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了一个学科比较完整的高校系统，教材也改用苏联教材。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高教部组织编写了一批自己的教材，谢义炳主编的《天气学基础》是其中之一。陈受钧作为助教，一边辅佐谢义炳教授天气学课程，一边协助谢义炳将讲课内容改编成《天气学基础》。1959年地球物理系成立，天气学和动力气象学专业及大气物理专业都有天气学课程，陈受钧成为大气专业的天气学主讲教师，一位刚刚25岁的助教。

文化大革命后期办短训班，陈受钧是数值预报班和暴雨班的主力讲师。对于1978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陈受钧是非常兴奋的。他承担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出题和批阅工作。陈受钧的教学任务是研究生课程“大气环流研究进展”。陈受钧的授课重点突出、新颖、吸引人。他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一张小纸片。他说有时候就写在烟盒纸的反面。每次上课前最重要是在脑子里过一遍，上课时就能一气呵成。教师一人在台上，台下几十双眼睛盯着你，讲课中一丁点儿差错都逃不过学生的眼睛。我的办公室和陈受钧对门，常见他在桌前呆坐。实际上是他在备课，在脑子里“过电影”。

陈受钧退休后清理办公室，把一个小黑包交给我，说里面装的是他的讲稿。上课和出差讲学，提上这个包就走。那是一种曾经流行过的公文包，是“北



本文作者（左一）和陈受钧教授在一起

【编者语】

2020年5月，北京大学气象系陈受钧教授不幸去世，本期摘刊陈受钧老师的挚友和同事陶祖钰教授的怀念文章，与读者一起怀念逝者在气象科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上做出的贡献。

方暴雨学术交流会”上发的。陈受钧不是没有讲稿，而是上课时不看讲稿。

我经常和陈受钧一起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陈受钧的质疑非常有特色。他提的问题看起来很小，几句话就能回答。但如果学生基本概念模糊，在资料和方法上有缺陷，或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认识肤浅，学生一回答，马上就原形毕露。陈受钧的质疑都是一针尖见血的关键所在，能够迅速考察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对学生也是一次重要的指导。

瞄准高原和暴雨——中国学者做出国际声望

在暴雨和中尺度气象领域，陈受钧教授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他用个人的国际声望推动了中尺度气象的中外学术交流。我本人在境外的工作访问，包括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德国慕尼黑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的台湾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无一不是陈受钧介绍的。20世纪80年代其他高校的教师出国做访问学者，不少也是陈受钧帮助联系的。陈受钧开辟的交流渠道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每年一次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尺度气象学术研讨会是陈受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是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单是为了确定研讨会的名称，他和NCAR的郭英华博士当时就费了很多周折。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与韩国的郑用升院士一起推动建立了中韩大气科学研究中心。

陈受钧讲过，“发表中文论文再多，外国人不看，你做了再多的工作，他们也不知道。”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精力都花在写英文论文上。陈受钧的国际声望就是建立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批论文上。大约是2013年，陈受钧将他1984—1999年发表的21篇英文论文进行了汇总。这些论文内容包括西南涡和暴雨、梅雨和季风、爆发性气旋等方面。这些选题大多和青藏高原有关，而青藏高原的影响是全球数值模式中一个关键性难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写作日期：2020年5月11日